

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探论

庆振轩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元祐时期是苏轼仕宦的巅峰时期,苏轼在新旧党的夹攻之中,纯文学创作渐少,实用性文字增多,内容繁富,其军事思想值得关注。对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两任边州所提出的具体军事对策和针对性举措,针对鬼章被擒所提出的“和、战、守”三者辩证关系的方略,以及针对辽和高丽提出的防范措施。

关键词: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11)02-0008-07

元祐时期在苏轼一生之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言其特殊,一方面是指其仕宦上的巅峰时期。他在元祐时期颇受朝廷重用,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臣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虽当世之豪杰,犹未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东坡后集》卷13《谢兼侍读表》)

而另一方面,由于元祐时期朝中党争的激烈复杂,由于苏轼在元祐初期既支持废除新法,贬谪新党,又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且与洛党“因嬉笑而成仇讎”,长期处于新旧党夹攻之中。八年之间,调动频繁,有一半的时间在地方上作官。他曾十分痛苦地说自己往往“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朝廷非不用臣,愚蠢自不安位。”(《东坡后集》卷13《定州谢到任表》)因此,对于朝廷的重用,太后的恩宠,苏轼感激涕零,誓死以报,在有关文表中一再表白:

臣荷先帝之遇,保全之恩,又蒙陛下非次拔擢,思慕感涕,不知所报,冒昧进计……

(《论给田募役状》)

臣等非不知言出怨生,既忝近臣,理难缄然。

(《论特奏名》)

今侍从之中,受恩之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论差役不便札子》)

但他冒死建言的结果,却是动辄得咎,政敌们“共出死力,构造言语”,无端攻击(《东坡奏议集》卷5《乞将台谏章疏降付有司根治札子》),数年之中,屡被围攻,使其心力交瘁,深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仇怨交攻,不死即废”(《东坡奏议集》卷5《乞郡札子》)。

因此,元祐时期,处于仕宦巅峰和处于新旧党夹攻中的苏轼的心态是十分复杂的,也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限于篇幅,本文拟对坡公元祐时期的军事思想进行研讨。

有宋一代,自一统大业奠定之后,即相继面临契丹、西夏、金、元蒙的侵扰攻略,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发展的情况下,士大夫皆好言兵,成为一代风气,喜论兵,乐从戎是宋儒时代忧患意识的表露。苏轼生当其时,奋厉有当世志,再加上其父

苏轼的影响,苏轼在一生的不同阶段,在军事上均有个人的见解,而其元祐时期在政在位之时的议论举措尤为值得我们关注。

相对整个北宋时期而言,元祐时期是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历史时期。除了元祐二年西夏联合吐蕃侵扰,因种谊擒鬼章而即请和之外,不仅高太后“无意甲兵”,其他邻国也相戒生事。因此,对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两任边州所提出的对策和举措、针对鬼章被擒所提出的“和、战、守”三者辩证关系的方略,以及针对辽和高丽提出的防范措施。下文依次言之。

元祐之于苏轼,以出知边州始,又以出知重难边州终。其针对当时边防实际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对策及相关举措,乃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格地说,苏轼知登州是在元丰八年,但元丰八年三月神宗逝世,五月王圭卒,朝廷起用旧党,拉开了元祐更化的序幕,苏轼正是在此时被起用知登州的。所以,从苏轼元祐时期军事思想的整体研究考虑,我们把知登州时期(尽管到任只有五日),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

“登虽小郡,地号极边”(《东坡集》卷25《登州谢上表》)苏轼在登州时间虽短,但就他个人了解到的登州防御的具体情况,离开登州后,他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建言献策,他认为,登州地近契丹,号为极边,自宋王朝建国以来,常在登州驻重兵,练习水战,早晚传烽,以通警急。特别是自庆历二年以来,这里设四指挥,成为京东一路的屏障。契丹知宋有备,所以未曾有事。但后来人们“见其久安,便谓无事”,经常调遣这里的兵力,四指挥轮番出差,无法教习水战,武备堕废。他要求朝廷明确降旨,“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以加强这一带的边防(《东坡奏议集》卷2)。苏轼在登州任仅留五日,所以对登州水军他只是提出教习之建议而未及实施。而在定州,他从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定州,于绍圣元年四月贬知英州,计半年有余,使他既能清醒地认识到定州边防之弊,又能提出相应对策并付诸实施。

定州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由于太平日久,边备十分松弛。苏诗“承平百年烽燧冷”即是他初至定州所看到的边防状况的极好概括(《东坡后集》卷3《雪浪石》)。面对定州军备的实际状况,苏轼建言:“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

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族。”(《东坡奏议集》卷14《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

为了加强边防,苏轼在定州短短的几个月内,采取了一系列十分具体的措施。首先是整饬军纪,“事不可悉数”。苏轼于《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中例举数事:

……如甲仗库子军人张金,一年之间,持仗入库,前后盗铜锣十二面。监官明知,并不申举。又有帐设什物库子军人田平等,二年之间,盗帐设什物八百余件,银二百五十余两,恣意典卖。军城寨人户采斫禁山,开种为田,公然起税,住坐者一百八十余家。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镑,召军民赌博。若此之类,未易悉数。(《三苏文集·集部·苏轼文集》卷35)

指出军政混乱的结果,是“致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民不安居。”

苏轼到任后,“备见其事”,采取果断措施,严惩贪赃枉法的首犯,“张金、田平等,皆以付狱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察觉,依法勘断张德等九人”;“开柜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陈首改业。其余并走出州界”。在其治理之下,“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警众是为了革弊,为了定州军纪的整肃,苏轼又致力于改善禁军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派人修治禁军营房。

然后是增修弓箭社。影响军队战斗力的有多种因素,由于积弊日久,苏轼发现,沿边禁军即使经过整饬,也“缓急恐不可用”,为什么呢?因其“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苏轼文集》卷35),如果马上对其严加训练,又恐邻国疑虑,招致战事。为万全计,苏轼上奏朝廷,请加强边州弓箭社的作用。

作为民间组织,保家卫国本为一体,且自澶渊之盟以来,边民自己组织的弓箭社,无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出众者为头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面耕作,一面备边,遇有紧急之事,击鼓集合,顷刻可致千人。他们“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弓箭社因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保甲法有所削弱。苏轼根据巩固边防的需要,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

势决不可废。”并条悉上闻。

同在登州的有关举措一样，除了提出并实施相关军事上的建议和举措之外，苏轼作为地方官，还往往提出并实施一些减轻边民负担、救助当地饥民的方略。安边尤须安民，苏轼深知此理。在定州，他上奏朝廷，请求减价常平米赈灾，又要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陈米贷与各户，待丰收时以新米还官。这样作的结果，“不惟乘此饥年，人户缺粮，优加赈济；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支遣；及免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东坡奏议集》卷14《乞降常平米赈灾状》；《东坡奏议集》卷10《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反映了一个既注重实际，又深谋远虑的巩固国防的可切实实行的策略。

元祐时期苏轼军事思想的研讨应该特别关注的是他在宋与西夏、契丹的和战及外交策略的论述和建言献策。

元祐初年，西夏再次进犯宋境，元祐二年八月，种谊收复洮州，擒吐蕃宰相鬼章，西夏见形势不利，再次求和。因高太后“无意用兵”，准备许和，苏轼连上章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今具见于《三苏全集·集部·苏轼文集》卷22、23四篇奏札中（《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

综观苏轼同时期的四篇奏札，苏轼安边息民之策在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重视。首先是针对擒获鬼章之后朝廷态度和处置措施献计建言。对于“生擒西蕃首领鬼章”，虽是“偏师独克”，“固亦可庆”，因为“俘获丑虏，功诚不细，赏劝后固不应轻”。但对宰相“欲以明日称贺”，苏轼认为不妥，原因在于边疆出兵非一，战争仍在继续，“朝廷方欲缉治边防，整肃骄慢，若捷奏朝至，举朝夕贺，则边臣闻之，自谓不世之奇功；或恩札太过，则将骄卒惰，后无以使。”所以苏轼提出了“镇之以静，示之以不测”的方略。与《论擒获鬼章称贺太速札子》密切相关的是，《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在这篇奏札中，苏轼再次提及“新获鬼章，威震戎狄”，要防止边将骄横之气，避免出现“边臣贾勇，争欲立功，以为河南之地，指顾可得”，若战事不断，“使诸羌知中国有进取不已之意，则寇愈深而兵不解”。所以建议朝廷“深诏边吏，叛则讨之，服则安之，自今以往，无取尺寸之地，无焚庐舍，无杀老弱，如此期年，诸羌可传檄而定”。

针对朝中把鬼章作为人质的“良策”，苏轼认为，就鬼章“凶豪素贵”之个性而言，必不甘于困辱，“将不食求死”；即或不然，其“老病愁愤”，“自非久生之道”。而鬼章若死，边乱无已。苏轼认为应该“放汝生还，质之天地，示以必信”，以服其心。“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结盟”，而西羌本与西夏世仇，而鬼章本与阿里骨不协，若许以生还，其众必相攻”，

若所在为仇敌，“正中国之利”。

对于《乞诏边吏无进取及论鬼章事宜札子》，茅坤曾给予极高的评价：“此乃文忠公缚虎手处，惜乎世不能用。”（《苏文忠公文钞》卷4，见《三苏文集·集部·苏轼文集》卷23“附录”）并且认为《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应“与前二札并看”。

《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是苏轼于元祐二年十月七日，“闻阿里骨上章请命，议者或欲许其自新”的消息后上的一道奏札。苏轼认为，阿里骨“凶狡反复，必无革面洗心之理”；他作出“上章请命”之举，是因为其“部族新破，众叛亲离，恐吾乘胜致讨，力未能支，姑匿情忍垢，以就大事”。若其“蓄力养锐”，“羽翼既成”，“必为中原之忧”。有鉴于此，苏轼认为朝廷应采取强硬政策，建议朝廷既不纳其通和之请，又不削夺其官爵，存而勿论，置之度外，阴使边臣以计图之。计之所出，即其文札中所言，“约鬼章讨阿里骨”，“以夷狄攻夷狄”。

对于苏轼有关鬼章被擒连续所上四篇奏章，前人曾认为应综合研究，黄震《黄氏日钞》卷62说：

论鬼章凡四状，谓阿里骨董毡贼臣，伪书求立，执事不审，轻授节钺，而鬼章叛。今虽得鬼章，不足辄贺，亦不可轻杀。当责其与温溪心共讨阿里骨，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且乞戒边吏，勿扰郡县诸羌之地，使兵连无穷，可谓精密之见矣。（《苏轼文集》卷22《附录》）

即就鬼章被擒之后，针对朝廷系列举措，苏轼的针对性的进策献言诚如黄震所言，“可谓精密之见”。但苏轼诸札之中对于西羌夏人的和战之论尤为值得重视，因为对鬼章事件的处置，事关眼前，可权宜处理；而对西羌、夏人的和战问题，则是长远的战略问题。

对西羌夏人的和战问题，苏轼在《乞约鬼章讨阿里骨札子》中略有提及，态度明确且强硬，原因在于：

……夏贼逆天犯顺，本因轻料朝廷，以为必不

能讨己,今若便从阿里骨之请,则其所料,良不为过。西蕃小丑,朝为叛逆,暮许通和,则夏国之请,理无不许。二寇滔天自若,欲战欲和,无不可者,则西方之忧,无时止矣。

而在《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对有关和战问题的透辟分析,更具战略眼光。就时势而论,“安危之机,正在今日,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则安边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将骄卒惰,以胜为灾,亦不足怪”,于是奏札“先陈前后致寇之由”,作为建言献策的事实依据。

苏轼认为,在昔神宗朝,“用兵累年,虽中国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几于亡”,“饥羸之余,乃始款塞”。“当时执政大臣谋之不深”,未能乘势制服夏人,反而厌兵,许其求和,并赐予无数,“既使虜因吾资以德其民”,“又使其窥我厌兵欲和之意”,使夏人认为“欲战欲和,权皆在我”,轻犯边陲,“利则进”,不利“复求和”,貽患无穷。

而眼前之见,乃是阿里骨乘董毡之死,匿丧不发,伪书鬼章温溪心等名以请于朝,当时执政“以省事为安,因其妄请,便授节钺,阿里骨自知不当立,而忧鬼章之讨也,故欲借力于西夏以自重,于是始有解仇结好之谋。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贼臣君我也,故怒而盗边。夏人知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详知“前后致寇之由”,苏轼还预测西羌夏人的策略意图:

意谓二圣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远迩,必无用兵之意,可肆无厌之求;兰会诸城,廊延五寨,好请不获,势胁必从;猖狂之后,求无不获。计不过此耳。

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苏轼认为,安边息兵,“待敌之要”在于“但使吾兵练士饱,斥候精明,虜无大获,不过数年,必自折困,今虽小劳,后必坚定”。只有国富民强,欲战欲和,主动权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避免“复蹈前日之失”——“则是欲战欲和,权皆在虜,有求必获,不获必叛。虽偷一时之安,必起无穷之衅”。

对于朝中“似以畏事为无事者”,苏轼给予了严正的批评,认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他恰切地比喻说:“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夫生事者,无病而服药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药也。”(《三苏全书·集部·苏轼文集》卷22)

苏轼所论,切中时弊,切实可行,既有解决眼前问题之现时性。又有关乎国家安危的长远战略

眼光,所以茅坤《苏文忠公文钞》卷4认为:

此疏处分,与欧阳公之议西事,并关朝廷之大者,可谓经国手。(《苏轼文集》卷22《附录》)

苏轼在元祐时期的军事思想还表现在他对于宋朝和契丹、高丽外交及商业交往方面的重视。《孙子兵法·谋攻篇》中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外交活动往往和军事行动密切相关。在北宋和契丹、西夏时战时和的复杂关系中,外交的作用显得重要而微妙。苏轼对此极为重视。关于苏轼对高丽在外交活动中带有军事目的的防范问题,王水照先生所著《论苏轼的高丽观》所论已详,我们在这里重提这个问题,旨在说明,苏轼针对高丽问题的论述,其指向乃在契丹。高丽的地理位置及与契丹、北宋的复杂关系决定了这一点。此择要述之。苏轼在元祐期间曾先后向朝廷呈奏七篇札子,论奏相关问题。所论具见于《论高丽进奏状》、《论高丽进奏第二状》、《乞令高丽僧从全州归国状》、《乞禁商旅过外国状》、《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他在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所上《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提出了“五害”说,论述十分详尽:

……(宋)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廩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实物,搅扰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客观地讲,苏轼对于高丽与宋外交上可能产生的弊害,远虑近忧,情理俱到。并且,苏轼不仅在道理上分析论列利害,且自己在身当其事时,根据具体情况,或不令高丽使者“住滞”,或因对方妄请,“不为奏闻”;或“处置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从方方面面见出苏轼对相关问题的重视。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探讨苏轼元祐时期的军事思想,而从苏轼上述几篇与高丽有关的奏札中,我们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表面上看,苏轼行文直指高丽使者,但其旨归则在强调国家对契丹的防范。苏轼在行文

中一再说:

……(高丽)使者所至,图画山川,购买书籍,议者以为所得赐予,大半归之。虽虚实不可明,而契丹之强,足以祸福高丽;若不阴相计构,则高丽岂敢公然入朝中国?有识之士,深以为忧。(《苏轼文集》卷25《论高丽进奏状》)

据泉州纲首徐成状称,有商客王应升等,冒请往高丽国公凭,却发船入大辽国买卖,寻捉到王应升等二十人,及船中行货,并是大辽国南挺银丝钱物,并有过海祈平安将入大辽国愿子二道。本司看详,显见闽、浙商贾因往高丽,遂通契丹,岁久迹熟,必为莫大之患。(《苏轼文集》卷2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乞三省密院相度裁定,一依庆历、嘉祐《编敕》施行。不惟免使高丽因缘猾商时来朝贡,骚扰中国,实免中国奸细因往高丽,遂通契丹之患。(《苏轼文集》卷28《乞禁商旅过外国状》)

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遣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

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发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可废。(《苏轼文集》卷33《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

……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二)

……臣所忧者,文书积与高丽,而流于北虜,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

引述东坡有关议论文字,我们说苏轼这七篇奏札,名为论奏与高丽的有关问题,但其旨归,则忧在契丹,文本具在,应无疑问。至于苏轼的观点“在现今韩国学者中颇有非议,是一个甚为复杂、也极敏感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认真考查一下当时契丹与高丽、北宋的利害关系,是会很自然地得出“苏轼的高丽观具有历史的正当性”的结论的。(王水照《苏轼研究》第319页)

苏轼鉴古览今,完全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从国防和军事方面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首先是关于防止因图书输出而失密,影响或损害国家形象和利益的问题。这不仅在当时具“有其历史的正确性”,而且在中外古今紧张对峙的敌对双方的对外关系中也是常态。

由于宋辽关系常处于时战时和变化复杂的关系之中,所以两国之间相互禁书流出。据有关史料载:天圣五年(1027)二月二日,中书门下上言,辽国使臣和商人“将带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于是宋王朝颁布了相应诏令(《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16),后来成为普遍施行的政策;康定元年(1040)五月,京师“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刻鬻卖,流布于外”,宋廷下诏:“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24)至和二年(1055)五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因此,苏轼的禁书之议无可非议,因为禁书中涉及“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边机文字”,“传之四夷不便”。

其次是涉及使者中“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虑为间谍所用之事,也是北宋朝廷一直密切关注并加以防范的重要问题。据沈括《梦溪笔谈》卷13载,熙宁时“高丽入贡,所经州县,悉要地图”,“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到了扬州被陈升之赚取后“聚而焚之”。高丽使者的作法实在是令人疑虑的。苏轼的弟弟苏辙甚而说:“高丽之人所至游观,伺察虚实,图写形胜,阴为契丹耳目”(《栾城集》卷46《乞裁损高丽事件札子》)。“或言契丹遣亲信隐于高丽使者之中,高丽密分赐予,归为契丹,几半之奉”。多人记载略同,可见苏轼的奏札绝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

同时,可以印证苏轼论奏观点的还有高丽在与辽宋复杂关系中的态度和外交政策趋向。早在文宗十二年(1058),文宗初萌与宋复交之念,内史门下省表示反对,认为“国家结好北朝,边无警急,民乐其生,依此保邦,上策也。昔庚戌之岁,契丹问罪书云:‘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是欲何谋?’又云‘其于中国,实无所资,如非永绝契丹,不宜通使宋朝’。”(《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高丽朝廷采纳了这些意见,也就是说,当是之时,高丽朝廷认为从地缘接近,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认定与契丹通好,“以此保邦”,才是“上策”;而与宋通

好,“实无所资”,还要付出“永绝契丹”的沉重代价。熙宁初,高丽礼宾省给宋福建转运使罗拯的信中更直言不讳地说:“蕞尔平壤,迺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勍敌。虑边疆之弗息,蓄陆贽之靡遑。”(《宋史》卷457《高丽传》)。由此可见,苏轼从地缘学及高丽与辽宋关系中的利害判断是十分准确的。

至于在与高丽外交交往之中,财政上耗费巨大的问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分析。一是接待及回赠,所费巨大。苏轼在杭州曾亲自接待来使,且在朝中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所撰有关诏草无虑数十,其中耗费他是十分清楚的;二是专门修建亭馆,劳民伤财。他在赴任登州途中,曾亲见建造有关亭馆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赋诗寄慨(《苏轼诗集》卷26《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三是其家学渊源的影响。其父苏洵《权书·六国》中的一段话应引起我们重视,苏洵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因此,苏轼奏札中有关“借寇兵以资盗粮”之论有现实考虑和家学影响的双重因素。

综观苏轼元祐期间一系列改革军事弊政的举措和诸多相关奏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我们感到有下列几个方面值得加以探讨。

其一,元祐时期,相对而言,是宋王朝边患战事较少的时期,正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苏轼在政治舞台上有了可以比较充分地发表个人政见的机会,从苏轼一系列改革军政弊病的举措和论奏中,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苏轼安不忘危,有备无患,在军事思想上,强兵固本,以己为主,掌握战争主动权的观念。对西羌夏人的和战问题,一方面是对目前所临的边防局势的针对性对策,另一方面,就宋廷而言,也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军事问题。苏轼认为,对于西羌夏人的屡叛屡和、屡和屡叛的问题,应该应之有道,处之有术,以达到长远的“安边息民”的目的,为达到这一长远目标,就要排除朝廷“畏事求和”的做法,避免西羌夏人窥知宋廷厌兵欲和之意,轻犯边陲,利进败和,欲战欲和,权皆在敌的积弊,进而强兵固防,兵练士饱,达到知彼知己,进可攻,退可守,和有所恃,掌握“欲战欲和,权皆在我”的主动权。

应该看到,终宋一世,宋王朝与契丹、金人、西夏、元蒙一直处于时和时战的十分复杂的军事形

势之中。总结历史,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宋代最有害于战备思想的是‘和’”。在宋廷之中,上至皇帝,下至臣僚,贿敌求和,息事宁人的观念时有流露,而让敌国有隙可乘。西夏即掌握了宋廷畏事求和的心理,“以和备战”,运用和来窥伺边境,收买爪牙,充实力量,麻痹宋方,乘虚入侵。因为“欲战欲和,权皆在虏”,给国家带来无尽弊害,在历经靖康之难后,宋人对宋廷“畏事求和”之弊有了清醒的认识,王庭珪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败亡的原因是,“敌独以一和字误中国”。其说谓:“自靖康之初,迄于今日,敌独以一和字误中国。何为循而用之,犹未已也?士大夫执请和之议,非独至愚无识,其处心积虑,止欲固爵位,保名宠,苟安目前无事而已。非有奇谋远虑,为宗庙社稷万世计也。且向来何尝不与之和哉!我之礼意日加,而彼之奸恶日肆;我之金币日遣,而彼之求索愈无穷。”(王庭珪《泟溪文集》卷26《上皇帝书》)王庭珪之上书在宋室南渡之后,国破家亡,痛入骨髓,故言辞激烈。实际上“敌独以一和字误中国”,并不自靖康之初始。苏轼其时已鉴往慨今,呼吁朝廷强兵固本,以求和战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其虑不可谓不深。贿敌以求和,乃是“借寇兵而资盗粮”,与“敌独以一和字误中国”,同样言简义明,且可谓警顽起懦。如果苏轼的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强兵固本,既不生事,又不畏事的以己为主,处处掌握主动的军事思想得以贯彻执行,靖康之祸应是可以避免的。

遗憾的是,苏轼的建言献策,当朝未予采纳。及宋室南渡,南宋朝廷依然在和战守三者之中,以和为主,沮军民抗战之心,助敌军嚣张之气。在其时有识之士论说和战守三者利害关系的言论中,我们时时可见苏轼的先见之明。孝宗隆兴二年(1164),王质上疏劝孝宗深察和战守之事。他为孝宗献计,应合和战守三者为一,即以战为主,以守为战,以和备战。(《雪山集》卷1《论和战守疏》)袁燮对此的解释是,“为今之计,莫若以守为主,俟其可战而战,则是以守为战;俟其可和而和,则是以守为和;和不可恃则站饿,战或未胜则守。合和战守为一,操纵在我,彼岂得而邀我哉!”(《絜斋集》卷17《秘阁修撰赵君墓志铭》)李纲身在前线,感受最深,十分精要地阐释道:“和战守其本一事,能守而后战,能战而后和。不务战守,而惟和是务,必致误国。”(《梁溪全集》卷80《缴进十议札子》)

但是,由于南宋小朝廷一味偏安求和,李纲等

人的建策依然未被采纳。北南宋相继败亡,和战之争一直是朝廷议论的一个焦点,但强兵固本、以战为主之正论在关键时刻往往被否决,如此江山坐付人,是十分惨痛的历史教训。

此外,如果我们联系苏轼在不同时期有关国防军事方面的论述,更能看到其军事思想的系统性、现实性、灵活性。苏轼在参加制科考试时曾上了二十五篇《策论》,《进策》中《策断》上、中、下三篇,都是苏轼为抗击辽和西夏而提出的策略。除此之外,《策略第二》、《策别》中的《教战守》以及,《训军旅》都讲到同一问题。

苏轼系统地总结了北宋王朝对辽和西夏妥协求和的教训,认为大臣不为长久之计,每年“出金缗数十百万以资强虏”之失策(《策略第二》),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赂敌以求和,和补课恃,“其势必至于战”。但朝野上下及物质准备都不利于战,“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蓄财用》)正是针对眼前形势,苏轼主张积极备战。

在对外战争上,苏轼一直主张争取主动,要战守的主动权在我。他说;“用兵有权,权之所在,其国乃胜。”“欲天下之安,则莫若权在中国;欲权在中国,则莫若先发而后罢,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战。”(《策断》)

但战争不是盲目的,苏轼深刻全面分析了宋王朝与西夏契丹的关系,认为契丹对宋的威胁要比西夏大。但两相权衡,“兵之所加”,应先西夏而后契丹。苏轼通过大小强弱和战关系的分析,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如果全面备战,西夏、契丹都是可以战胜的。

在神宗朝,针对宋神宗“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而“群臣百僚,窥见此意,多言用兵”的情况,苏轼代张方平写了《谏用兵书》,告诫朝廷“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应谨慎边事。这和元期间上疏戒边将生事是一致的。

因此,联系苏轼一生的军事思想,十分可贵的一点即强国固本,掌握和战的主动权;不畏事,亦不安生事。

特别令我们从人格精神上佩服苏轼的是,苏轼在元祐期间虽然可谓飞黄腾达,备极荣耀,有了在军事边防上充分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但在政敌的恶意围攻之下,已是心力交瘁。其出守定州之时,又值朝政巨变,个人命运再现危机之际,但他敢于为国直言,为民族危难勇于任事的勇决态度,让人叹服。

宋人有两则记载,可以略见苏轼在朝中上言、在定州改革军政弊病的恶劣环境:

轼在翰苑,颇以言语文章规切时政。毕仲游与之书曰:“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皆言语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官非谏官,职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犹抱石而救溺也。”轼不能从。(《宋元通鉴》)

李端叔名之仪,其先景城人,后居当涂。举进士,力学善著文,为东坡所知。元祐八年九月,坡出帅中山,辟掌机宜文字。是时,时事将变,端叔策知其然,相与反复议论,先生是之曰:“自是知相从之日难得,期与子游戏于文词翰墨,以寓其乐。”(《苏诗施注》)

立朝为政,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虽危身触讳而不避,更何况边防军事乃国家大事;及出守定州,国事将变,虽已洞悉一切,但仍于危难之际,勇于革弊政,固国防。因此研究苏轼元祐时期之军事思想,其有关国防军事思想的战略远见性,深刻性、针对性、一贯性,固然值得称道,其一有机会,即亲革弊政,把个人的思想理论付诸实践的作风,更值得推崇。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其论述,“莫非据古而切于事”,“比立朝,遂将力行其所言”,“虽见险犹不止也(李之仪《姑溪集》)其为国家民族舍身忘我的精神与其一生的军事著述和具体举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在搜检相关资料时感受最深的一个方面。